

样子，和平共处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思考这些问题时，可以回到 Malinowski 那里去。他在《文化动态论》中得出一个值得我们发挥的结论：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致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这个结论很重要，是他从非洲殖民地上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殖民主义不可能解决文化共存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

人之为霸，以理服人之为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所以我在七十岁生日那天提出这样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998年6月15日 北京大学

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

陆 学 艺

到今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50周年华诞。在这半个世纪的进程中，共和国经历了辉煌和风雨、繁荣和坎坷，与其血脉相依的社会学同样走过了沧桑多变的岁月，经验和教训并存，喜悦与痛苦相随。为纪念共和国的五十华诞，为了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使我国社会学在下个世纪有更好的发展，回顾和总结我国社会学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是十分重要的。

一、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社会学是一门与人类现代化进程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应该可以说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正是西欧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阶段，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秩序面临着挑战，同时启动现代化并伴随它成长的现代科学的理性曙光，照亮了人类进一步具体而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构成和变迁的道路。于是，一门研究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和社会稳定、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的社会学^①应运而生。社会学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著作和社会学理论，对整个人类现代化发展产生了越

① 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丁·孔德 (Auguste. Comte) 于1838年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第一次提出来社会学一词，但真正使社会学获得学科地位的是另一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E. 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社会学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经济学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与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发展水平相比,社会学在我国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和滞后。这当然与社会学进入我国的时间较晚有关,更与它在我国所遭受的坎坷经历分不开,这正是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结构还处在现代化初期的反映。

曾经有人认为,社会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辅助工具,这种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实际上,上世纪末社会学之所以进入我国,与当时我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改革直接有关,它与我国现代化启动的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当时我国社会变革(特别是戊戌维新变革)的需要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科学依据,是我国一些具有先进的革命思想家、改革家主动去找来的理论武器。1891年康有为先生为变法办学、培养人才,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最早给学生讲授“群学”,把这一课程列在经世之学的门类里。后来严复先生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译成《群学肄言》,他先译了这本书头两章“砭愚”和“倡学”,1898年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汇编》上,1903年出了全书。1902年,章太炎先生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1903年吴建常把日本市川源三的译著《社会学

提纲》,(原作为美国学者季延史著的《社会进化论》)在《教育志丛》出版。在20世纪初,群学和社会学是混用的,以后“社会学”才取代“群学”,一直沿用至今。^①

正是在这一个时期,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了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社会变迁,这种变迁伴随着内乱外患、国家和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孜孜以求,试图以社会学独特的学科视野,不断地探索一条救亡图存、渐进改良、振兴中华的道路。尽管受时代的客观条件和他们自身的限制,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积极成功的效应,但是却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社会学走进了我国的高等学校大门,吸引了一批批年轻学子。最早在我国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是外国人,早在1908年美国孟教授(Arthur Monn)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13年美国教授葛学博(Daniel Kulp II)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社会学系,1912年国立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设有社会学课程,1916年才开设社会学班,康心孚教授担任授课,成为我国自授社会学课程的第一人。他是章太炎的学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大任教,讲授社会学等课程,讲义是自编的,培养了一批学

①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第27~2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生,后来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就是他的学生。朱友渔是我国留学国外的学生中最早主修社会学的,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回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①

伴随着20年代后期中国在美欧和日本留学的社会学者回国服务,以及本国高校社会学系或专业自己培养的学生毕业走上社会,推动了社会学事业的发展,社会学人才大量涌现,他们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最初的社会学调查是由教会学校的外国教授指导学生所做的小型调查,如1914和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对302个洋车夫生活情况的调查,是我国最早的社会学调查。1917年清华学校教授狄特莫指导学生,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调查。进入2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开始对当时的许多中国社会问题开展了调查,如1924和1925年李景汉等人在北京调查了1000位人力车夫、200处出赁车厂和100个车夫家庭,后来还调查了北京的店铺和工人行会状况;陈达教授于1926年指导学生调查北京的零售物价。进入30年代社会学调查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大量的调查著作陆续发表,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和《定县社

会概况调查》、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和《人口问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陈翰笙、薛暮桥等人组织了对江苏无锡、山东潍县、广东梅县等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写出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和《亩的差异》等调查报告和著作。这些社会调查涉及到我国当时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如家庭、社区、工业化、农村和农民、都市社会、人口等问题,具有很高的社会和学术价值。与此同时,社会学理论著作和译著也大量出版,如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其中有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吴泽霖的《社会约制》等共15种,对我国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30年代前期和中期,我国正处于内乱外患的时期,但是并没有完全影响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在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学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因为正是这样的内乱外患、社会问题丛生的现状促使社会学家们去认真的思考、调查和研究,大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3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以各种不同方式,探讨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30年代前、中期,中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

①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第29~3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度,涌现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出版了一大批社会学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在国际社会学界也有相当的地位。遗憾的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沦丧,许多大学停办或迁到内地,社会学也受到战争的摧残,不少社会学系停办,社会学系的师生散失很多,部分院校迁到西南后方后,还保留有社会学系。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如吴文藻、陈达、吴泽霖、李景汉、潘光旦、晏阳初、费孝通、戴世光、林耀华等都集中到昆明、重庆、成都和贵阳等地,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社会学的教学、社会调查和科研活动,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新区研究形成一种风气,并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努力,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培养了一批人才。据统计,抗战8年,在西南9所大学的 sociology 系,毕业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后来,多数成为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骨干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到后方的院校都陆续内迁,社会学家们都回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在各校恢复或新建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开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活动。据孙本文先生1947年12月的调查,那时在各大学任教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社会学教员有144人,其中10名是美国人。在这134名本国教员中,107名都是在国外留过学的。到1948年,全国共有21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在校学生

约六百余人。

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亲切接见了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人士,其中有民主同盟成员、社会学家费孝通,民主促进会成员、社会学家严景耀和雷洁琼,毛泽东坦诚地同他们交谈,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表示了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展望了新中国建立以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的前景。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这本应为我们社会学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也应为社会学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是历史的现实发展,却不似人们设想的那样平坦,尤其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不久就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境遇。

从1949年到1951年,各大学还保留原有的社会学系和专业,招收学生,正常教学,在课程上增添了“马列名著选读”、“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如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基本上还维持原状,还有70多位学生和16位社会学教员,只有少数老师去搞土改。不过当时毕业的许多学生(甚至还有没毕业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南下工作团,参加革命和建设,那几年很少有毕业生留在学校从事社会学教育和研究。到1952年,全国还有10个社会学系,472名学生。这年秋天国家对高校院系和学科进行调整,撤消了8

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停止招收社会学专业学生，1953年，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两个人类专业也撤消了。从此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排除出了大学的科学殿堂。社会学人才也纷纷流失、转行，拿北京的几所大学而言，一部分社会学老师（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泽霖等）转到民族学院，从事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还有一部分老师（如吴景超、李景汉等）转到了人民大学，严景耀、雷洁琼等老师被转到政法学院。再一部分老师（如陈达、史国衡）转到劳动部劳动干部学院。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更没有人专门再研究社会学，他们主要被分配到政府管理部门，如建筑公司、公安部、南下工作团、报社等部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再进行社会学调查和研究。

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就被撤消而停止招生了呢？当时是在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名义下和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一起被撤消的，有关方面没有专门说明理由。一直到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后，有人分析，1952年撤消社会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50年代初，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学习的参照系是苏联，把苏联的一系列做法视为榜样，奉为圭臬，而苏联早在20年代和30年代，就把社会学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取消了。我国的院系调查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所以也就把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取消了。第二，

在理论认识上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思想武器，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也就可以不需要社会学了。第三，有人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学主要是探讨研究社会问题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社会里就不再存在那些问题了，即使有些社会问题，靠社会主义自身就解决了，因而也就不需要社会学了。所有这些作为1952年撤消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只是在主持院系调整工作的领导决策层里，并没有明确宣布。当撤消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的决定一公布，广大社会学工作者虽然有的思想不通，但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还是作为行政决定接受了、服从了，所以撤消和人员调遣等工作的进行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正因为1952年撤消社会学没有说明撤消的理由，所以有一部分社会学工作者，虽然调离了社会学系或转行，但他们仍还在继续进行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一批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如潘光旦教授对土家族的调查研究，费孝通教授的重访江村，李景汉教授在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调查等等。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国内出现了新形势，对社会学的看法变化了，同年8月苏联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荷兰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学大会，以后陆续就

有一些关于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言论和活动。这些动向受到中国社会学者的注意。1957年春,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分别提出了要求恢复社会学的建议。1957年4月,在有关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社会调查工作委员会”,由著名社会学家陈达教授主持。当时的学术刊物《新建设》,还专门召开关于社会学工作的座谈会,并发表了座谈会纪要。

1957年6月以后,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北京的社会学家们首当其冲,受到无辜的揭发和批判,费孝通、吴景超等教授被公开点名批判,把关于要求恢复社会学教学研究的建议,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阴谋,参加过座谈会的学者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还株连了一批青年学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当反右斗争进入火热的时候,当时主掌中国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的康生,1957年8月在北京亲自出面发表讲话,信口雌黄,给社会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强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康生把中国的社会学先定性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继而指责社会学散布改良主义,缓和阶级斗争,破坏、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服务,甚至污蔑社会学是帝国主义的侦探学,把一批社会学家做的社会调查,说成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

保护资产阶级,破坏革命的。康生的这个讲话,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相当多的社会学家被打成右派分子,是与此有关的(比例之高,在其他学科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如此,因为康生那时在思想理论界是有权的,在反右运动中,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期里,还对社会学这门学科,专门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批判,把社会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是用来破坏革命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对一门学科进行如此大张旗鼓,违背事实和理性的鞭挞,也是绝无仅有的。^①

1952年撤消社会学系和专业以后,社会学的名还在,社会学家还在,还不断有一些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活动,不断有一些社会学的文章发表,但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及对社会学的严厉批判,社会学这门学科就被彻底地取缔了。自此以后,规范的、有组织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活动没有了。一直中断了22年之久。现在回顾起来,取缔撤消社会学是很不理智、很愚蠢的一种做法,这是在那一阶段执行极左路线的一个方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为停办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停止了招生和教学活动,造成了社会学人才的严重短缺和断代,因为停止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活动,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① 参见王康:《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中国社会学年鉴》,第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失去了社会学的智力支助，已有的经过许多社会学家艰苦开创和积累起来的智力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使许多社会决策由于缺乏正确理论指导和科学资料而陷入误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及其教学和研究机构虽然被撤消了，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依然存在。社会要发展，就要不断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要不断对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所以在社会学被取消之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自觉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活动是无法开展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所主张的一些观察、调查社会的理论、方法和活动也就消失了，因为要科学地认识这个社会，把握这个社会，描述这个社会，解释原因，预测社会的未来走向。离开了社会学主张的那套理论方法和活动，就很难科学有效地进行，这正体现了社会学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所以在社会学被撤消取缔后的 27 年中（1952～1979），有些原来属于社会学范畴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就以其他名义进行了，如人口问题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家庭婚姻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大型系统的民族调查和研究；犯罪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劳动劳工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等，都还继续在进行着。有些事关全局的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如合作化以后，对于农民

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前后对农村问题都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还有更多的学者和个人在这些年里在实地进行观察、调查并如实记录了许多社会事件。所有这些，都在当时当地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为日后的社会学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不致使这段社会历史完全空白，无形中延续了社会学的一些传统和做法。当然，如果从严格的科学规范来衡量，这些社会调查和研究，还不能界定为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些调研活动，缺乏宏观的社会学理论指导，并没有在对社会进行总体、综合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在方法上也主要是靠经验的手工式的操作。所以，这些社会调查虽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只得到了事倍功半的结果，甚至有的社会调查还起到了事与愿违的作用。这再次证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能取消的。

本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时代^①，这是一个要依靠科学理性引导行动的时代。仅凭经验主观决断和

①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 20 页，商务印书馆，1986。

个人感情，势必会出偏差，用以指导社会行动，那势必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有这样的惨痛教训。国内外的实践证明，社会学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它是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持。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等同志重新出山，拨乱反正，使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宏伟事业重又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正在我国现代化事业重又启动之际，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敏锐地感到了社会转轨、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需要。1978年6月，长期受“四人帮”迫害，被监禁了7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老教授杜任之，在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要恢复重建社会学、政治学的主张，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约见费孝通教授，商讨了要尽快恢复社会学的事宜，请在京的一些社会学者协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1979年3月15~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邀请了北京和部分省市过去曾从事过社会学教学、研究的同志以及教育、

民政、公安、工会、妇女、青年团等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还有热心支持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到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如何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3月16日，胡乔木同志亲自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为社会学恢复名誉，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乔木同志还就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社会问题，如何研究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学习借鉴国外社会学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看法，并表示要尽力支持社会学界成立社会学研究会，开展社会学研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要尽快建立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抓紧培养社会学人才，注意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

这次“社会学座谈会”开得很成功，胡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领导者，由他出面为中国社会学从政治上平了反，在学术理论上澄清了一些过去流行的不正确的观点，这就为社会学的重建、恢复和发展开辟了道路。1979年3月18日，经过与会同志的酝酿，一致赞成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选举产生了由50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并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

长,田汝康、陈道、杜任之、李正文、罗青、林耀华、雷洁琼为副会长,聘请于光远、陈翰笙、吴文藻、李景汉、赵范、杨堃等老一辈专家学者为顾问,决定王康为总干事。这次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的开始,从此结束了中国社会学停顿 27 年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就在这次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费孝通教授开始筹建。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检讨了过去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的同时,提出了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要求。他说:“政治、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对恢复重建社会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力的支持,20 年来,社会学

工作者一直是铭记着“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这个指示,在努力工作和深入研究的。

二、社会学重建 20 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国社会学从 1979 年开始重建,至今正好 20 年,这 20 年可以说是中国自有社会学以来最有生机、最为繁荣、发展最快、最有成就的 20 年。20 年前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任务,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学正在成为社会科学总门类中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和欢迎的一门学科。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社会学在这恢复重建的 20 年中,也经历了起伏和波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 1979~1985 年,社会学重建后的头几年,开局很好,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只 5~6 年工夫,全国就在 11 所高校建起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有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学研究化;自 1986~1991 年,高校建立社会学系的工作几乎停滞了,有些院校自发建起了,也迟迟得不到批准,而不能正式招生,1990 年还因为一个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批评社会学是“敏感学科”,迫令全国社会学专业停招一年学生。那几年,社会学对外合作交流也受到限制。1992 年以后,社会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每年都有新的社会

① 《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 181 页。

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建立,队伍迅速扩大,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成就更加显著。

社会学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而恢复重建的一门学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实践对社会学的需求,是社会学发展和繁荣的原动力。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中国社会学也就在这样好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发展起来,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一)建立了一支专业队伍,确立了社会学作为重要学科的学术地位

社会学要“补课”,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组建队伍、培养人才,开展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建设。在创业之初,身负重建大任的费孝通教授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学科必须具备“五脏六腑”的计划。五脏是指:要有学会、专业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图书资料中心和杂志社及出版社;六腑是指社会学系至少要开设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有了这“五脏六腑”,社会学的戏台就可说是搭起来了,就可以演出雄壮威武的好戏来。

1. 社会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建设

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建立后,就着手招兵买马,组建社会学所和专业队伍,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80年1月8日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

个国家级的社会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费孝通,副所长王康,党委书记陈道,顾问赵范。全所科研和工作人员共20余人。随后,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便着手开展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工作,于1980年4月,组织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吸收各地有志于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中青年参加,聘请美国和香港的社会学家以及国内的学者们来讲课;1981年和1982年,又先后在北京、武汉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三次讲习班共有120多人参加听课和学习,为各地培养了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骨干,现在各地的社会学所所长、副所长,各高校社会学系主任和副主任,基本上都是讲习班的成员,大约有一半后来成了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

1981年11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1982年3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立社会学研究室,1983年,天津、四川、湖南、甘肃等省市的社科院分别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4年4月上海社科院正式成立社会学人口学研究所,同年山东、贵州、湖北、陕西、辽宁等省的社科院相继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5年以后,吉林、河南、福建、宁夏等省区也陆续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1985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以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

大学、四川大学都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心理学研究所。1988年民政部成立社会保障与社会进步研究所,以后,公安部成立社会问题研究所,国家计委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所。到199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了西藏、青海等省区外,都在社科院里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有些省会城市如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等大城市都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加上各大学和国家有关部门建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全国已有各类社会学研究所四十多个,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社会学专业研究队伍。这些社会学研究所,多则近百人,少则十多人,也有五六人的,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研究。近20年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省市设定的研究课题,开展了对外的合作和交流,都有相当丰硕的成果。

2. 高等院校社会学系和专业的设立和发展

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严重短缺,是1979年我国社会学重建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也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了应急,开头几年办了培训班,这样的培训班对启动我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速成办法却无法解决社会学人才的长期供应和需求问题。在高校设立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招收社会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提到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重要议程上来,这也是中国社会学迈向长期发展和繁荣的制度

化保证。

1980年夏天,上海大学文学院(原是复旦分校)成立了我国恢复社会学以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同年秋,南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并在教委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支持下开办了社会学专修班,从各大学选了一批二三年级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等系的学生,对他们进行社会学专业培训。以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还开办了多次研究生班,进行正规的教学,为各地培养了一批专业骨干。1981年中山大学设立社会学系,1982年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学系。随后许多大学开设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如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到1985年全国已有11所高校建立了社会学系,在校本科生800多人,研究生近200人;1986年以后有一些滞缓;1992年以后,清华大学组建了哲学社会学系,华中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组建了农村社会学系,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等都相继建立了社会学系,有的是新组建的,有的是在历史系或马列主义教研室等基础上改建的。现在除了内蒙、河北、山西、江西和几个边疆省区外,各省市都在大学里建立了社会学系或专业,像湖北、江苏等省已有五六所院校建立了社会学系。到1998年,全国已有40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社会学系和专业,

或社会工作系和专业。全国已有 20 个培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点, 5 个博士研究生点,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还有三个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人民大学) 在校本科生 3000 多人, 研究生约 400 人。此外,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成人高校、军事院校、政法院校、工青妇院校、民政院校以及医学院校和体育院校都纷纷设立社会学教研室, 或开设社会学或社会工作课程。1985 年中国社会学会等单位联合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函授大学, 通过函授大学先后培养了约 4 万名学生。

随着教学队伍的不断壮大, 社会学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教学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宽, 所有课程都是由我们社会学系和本校的教员自己授课。课程设置从残缺不齐向系统而完善的课程设置转变,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巨大成就。从教材的编写水平和种类上也得到明显的体现, 1982 年为适应教学需要, 费孝通教授亲自主持、动员一批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编写了一本《社会学概论》, 后来各校各研究所甚至个人都编写社会学概论或原理, 至于其他社会学课程的教材, 为适应教学的需要也源源不断地编写出来, 如《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统计概论》、《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学史》、《西方社会学史》、《中国农村社会学》、《社会保障》、

《城乡社区发展》、《社会行政和社会管理》、《社会指标体系》、《组织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老年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等, 已经初步满足了当前的社会学教学和传播的需要, 现在有关方面正在编辑出版《社会学文库》, 正在编译出版社会学专业方面的重要的国外文献。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将会越来越完善, 水平将越来越高。

3. 社会学学术团体的建立和活动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是从建立中国社会学会研究会正式开始的。学会成立以后, 就着手筹建社会学研究所, 以后又举办社会学讲习班, 推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社会学会、建立社会学系和社会学所, 参与制订全国“六五”、“七五”社会学科规划, 以学会的名义组织社会调查研究 and 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社会学重建伊始, 中国社会学会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开拓工作, 很有成效, 功不可没。

1979 年 9 月 19 日, 上海市社会学会建立, 首任会长是著名社会学家曹漫之, 这是地方最早成立的社会学会; 1980 年,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社会学会和湖北省社会学会成立; 1981 年, 天津市社会学会、吉林省社会学会和北京市社会学会分别宣告成立; 1982 年, 江苏省社会学会在南京成立, 1983 年以后, 四川、山东、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浙江、湖南、内蒙古、甘

肃、河南等省区，都相继建立了社会学学会。

1982年5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修改了会章，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选举产生了由69人组成的第二届理事会，选举费孝通为会长，雷洁琼、杜任之、罗青、李正文、陈道、林耀华、田汝康为副会长，吴承毅为秘书长。1985年3月和1986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常务理事会和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研讨了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针等问题。1988年8月，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召开了“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有近200名社会学工作者和社会工作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参加，提交了100多篇学术论文，会后编辑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社会学》一书，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1990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纪念会，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社会学学会的主要领导和兄弟院所的领导以及著名专家学者邓力群、费孝通、雷洁琼、胡绳、丁伟志、郑必坚、李慎之、江流、刘启林、袁方、陈道、赵范、邓伟志、王家福、孙越生、何建章、郑杭生、高德、王焕宇等150多人出席会议，会上胡绳院长、费孝通、雷洁琼教授和所长陆学艺分别讲了话，就社会学的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学建设中的作用和进一步办好社会学研究所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在当时社会学的发展又受到了类似“社会学

是敏感学科”等非难的背景下，这个会议起了很好作用。

1990年8月，经过长期酝酿，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会由各省、市、自治区推荐的62名理事组成，会议通过修改了会章，选举费孝通、雷洁琼为名誉会长，选举袁方教授为会长，王辉、陆学艺、吴铎、何肇发、郑杭生为副会长，陆学艺兼秘书长。会议重申学会要组织协调社会学工作者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发现并培养人才、组织社会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学会还接受与会代表的建议，以后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就每年社会学面临的学术和工作中的问题，撰写论文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增进全国社会学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这个建议和决定，得到了各地社会学者的欢迎和响应，从1991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每次会议有一个主题，收到100多篇论文，有100多人参加，会后出一本论文集，社会效果很好，至今已持续9年了。1991年3月在天津由天津社会学会承办，召开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学术研讨会；1992年4月在杭州，由浙江省社会学会承办，召开了当前社会变迁与小康社会研究学术研讨会；1993年4月在深圳，由广东省社会学会与深圳社会学会承办，召开了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1994年在上海浦东，由上海社会学会承办，召开了社会保障与

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1995年，因同年10月召开亚洲社会学大会，很多社会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有再另开本年的年会。

1996年8月在沈阳，由辽宁社会学会承办，召开了21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学历史使命学术研讨会。同时，在沈阳召开中国社会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推选费孝通、雷洁琼、袁方为名誉会长，选举陆学艺为会长，王辉、王思斌、邓伟志、吴铎、宋林飞、谷迎春、郑杭生、赵子祥为副会长，宋家鼎为秘书长。1997年5月在昆明，由云南社会学会承办召开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1998年在福清，由福建社会学会承办，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中国社会与社会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1999年6月在武汉，由湖北社会学会承办召开以纪念中国社会学会恢复重建20周年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讨会。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不少省的社会学会在市和县也分别建立了市社会学会和县社会学会，吸收当地社会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如民政、劳动、司法、工会、青年团、妇联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研讨社会问题等学术活动。90年代以后，各省、市的社会学会也仿照中国社会学会的办法，每年召开学术年会，就当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进行研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1990年第三届理事会建立以后，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适应社会学各分支学科发展提高的需要，陆续建立了各分支学科的专业委员会。现在已经建立的有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研究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农村社会学研究会，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研究会，体育社会学研究会，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会，青年社会学研究会等七个专业委员会，他们都属于中国社会学会管辖下的研究会。在各自的分支学科范围内，吸收本专业的科研和教学以及有关部门的学者和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参加，开展专业学术活动，理论联系实际，起到了推进和提高本专业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作用。有些专业现在还在积极筹建，如劳动社会学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生活方式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思想史研究会等等。在地方社会学会属下，有些省市也设有专业委员会，开展有关的学术活动。如上海市社会学会就下设有11个专业委员会，他们分别是：社会学理论与教学，青少年研究，生活方式研究，城市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法社会学，住宅社会学，产业社会学，外国社会学，性社会学，社会公共安全等，还有一些专业委员会正在筹备。

中国社会学会从组织上说，主要管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1996年第四届理事会修改会章后才设），团体会员有两类，一类是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社会学会；一类是各分支学科的专业委员会。从人员

上说,这两类团体会员吸收的个人会员,据1991年的统计有5909人,现在约有7000多人。此外,中国心理学会、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也都挂靠在社会学系统里,还有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等,以社会学大系统说,全国的会员已超过1万人。

4. 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成长起来

中国社会学的队伍,20年来发展是很快的。参加中国社会学会活动的会员,主要分为从事社会学科研究、教学的专业工作者和从事社会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两类。就专业工作者队伍说,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员组成。

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所(室)的专业研究人员;

②由教育系统各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系、专业,社会工作系、专业等教学单位的教员,以及这些院校设立的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教学人员(有些系、所合一的),现在这支队伍人数最多,发展最快,方兴未艾。

③由全国各级中共党校、军事院校、干部学院、政法院校、理工农医院校、文艺体育院校、成人高校开设社会学概论或各分支社会学课程的社会学教室的教员和研究人员。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部分人员发展也很快。

④中央和地方党和政府、人民团体等实际工作部门的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研究机构,如国家发展计划委、

科技部、民政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发展研究中心、统计局、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系统设立的政策研究室和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中的专业研究人员。

⑤企业和民间的一些社会调查机构和社会咨询机构的社会学专业工作人员。初步统计,前三类即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现在约有3500多人。据我们调查,这批社会学专业的研究和教学人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重建恢复前就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如费孝通、雷洁琼、王康、袁方、刘绪贻、何肇发、韩明谟等老教授,他们都已年逾古稀,但仍以老骥伏枥的精神,身体力行,孜孜以求,继续在进行社会调查、社会研究,为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奠基和搭台的工作,并且至今还不断有专业的论文和著作问世;第二部分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从哲学、外语、历史、文学、理工科专业或实际部门工作转行过来的,他们经过社会学专业的培训或经过长期刻苦自学,成为社会学的专家、学者,20年来,这部分同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带动和感召下,边干边学,努力拼搏,开拓进取,为社会学在各地、各系统的重建和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社会学的调查和课题研究费了很多心血,取得了很多社会学研究成果,他们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中起到了铺路搭桥的过渡作用。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央和地方社会学研

究所的所长、副所长、研究员，各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副主任、教授多数是这些同志担任的。现在这部分同志有的已年逾花甲，有的也年近花甲，正陆续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但绝大多数仍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有的已有较重要的社会学学术著作出版；第三部分是社会学重建恢复后，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毕业或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硕士和学士，他们组成了现在社会学系统的主要骨干队伍。这部分同志是社会学专业科班出身，学有专长，年富力强，对国内外社会学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继承了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其中一部分优秀成员已经成为各学术机构的专业骨干和领导者，有些在学术上已有很多成就，有社会学的专著面世，未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寄托在这一代中青年社会学者的身上，这是可以期待的。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为例，可以说明这个情况。这个所，现在全所共有 91 人，专业研究人员有 73 人，其中有博士学位的 24 人（在国外获博士学位的 7 人），有硕士学位的 26 人，全所在职的 20 名研究员中，有 12 人是中青年骨干，7 名博士生导师中，有 5 人是中青年。全所的科研专业人员平均年龄为 43 岁，只有 9 人是 1965 年前大学毕业生，现在研究所的领导和八个研究室及《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主任只有两位是 1965 年前的大学毕业生。从这个所可以看到中青年社会

学工作者未来成长的前景。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3500 多社会学专业研究和教学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地区分布也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广州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其次是各省会城市一般都设有省和市的 sociological 研究机构，有的还有教学机构。但在中部特别是西部几个边疆省区，有的只有研究机构没有教学机构，有的教学和研究机构都没有，可说还是空白。因为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恢复、重建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目前社会学专业队伍的发展和分布状况是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状况相适应的，东南沿海诸省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得最好，中部次之，西部则相对落后些。当然，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但是要发展得尽如人意，还得要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这需要我们同仁们的努力。

5. 关于社会学刊物和图书资料中心的建设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后，于 1980 年 1 月 24 日向院党组的第一个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图书资料室，要办一个刊物，“《社会学研究》上半年做准备，下半年发稿，预计出二三期”。1981 年，经过筹备，内部出版了《社会学通讯》，以后又以《社会调查与研究》为名出版，1982 年社会学所编译室内部出版了《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

这两个刊物以后定期、不定期地出了好几年,编发了很多国内外学者的文章和调查报告,在社会学重建初期起了很好的作用。经过多方筹措,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研究》于1986年初创刊,向国内外正式发行,这是社会学系统的主要学术刊物,双月刊,至今已出版82期,已发表了1000多篇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多数是这10多年来社会学科学研究的重要优秀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动向。

1981年10月,上海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社会学杂志》出版,这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后最早公开发行的社会学刊物,原为季刊,1983年1月改为双月刊,1988年1月改为月刊。创刊18年来,已逐步形成本刊的风格,注意追踪时代发展的潮流,透视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受到社会和读者的欢迎。此外,北京市社会学会主办发行了《社会学与社会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了《社会调查与研究》,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等都筹办过社会学的刊物,后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公开出版发行或公开了又转为内刊。现在社会学这门学科已有了很大的队伍,社会学专业的研究和社会调查受到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至今只有两个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业杂志,确实是太少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

建立,就开始着手建图书资料室,工作人员到处采购社会学的专业图书,当时主要是三类:一类是1957年前出版的社会学著作和文集;一类是港台出版的社会学专业图书;还有一类是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购买外文版的社会学著作。此外还有一些是接受国外友好人士和团体所馈赠的外文书籍。那时旧书店已经凋零,解放前出版的许多著作很难买到,只得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去复印,到80年代中期,社会学研究所的图书和资料已有34000多册(件),成为初具规模的社会学专业图书资料中心。1991年,社会学所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分设,专门配备工作人员收集和整理有关社会学的研究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以及有关资料,为科研和教学工作服务,至今这些资料的积累已超过万件。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80年代中期,东京大学教授、日中社会学会的创立者、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先生把他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近50年所积累的全部藏书和资料,都无偿赠给了社会学研究所,所里专门为之登录整理、编目上架,特别成立了福武直文库。1994年,日本庆应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十时严周教授,在他从庆应大学退休之际,把他的全部藏书和资料,都无偿地赠给了社会学研究所,所里也专门为之建立了十时严周文库。这两个文库都已向国内外开放。因他们都是日本的著名学者,几十年收藏了许多很宝贵的图书和资料,有些在日本也很难找到

了,所以经常有不少日本学者和日本留华学生到这两个文库来借阅使用这些图书资料。

类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图书和资料中心在各地的社科院社会学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社会学系,也都相应建立了社会学专业图书资料室,有的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二) 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应用研究和社会调查

在社会学重建初期就确定的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行双百方针,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着重研究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积极开展社会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为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20年来,广大社会学工作者就是按照这条方针实践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年来,社会学界在译介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对我国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著作和调查报告,使社会学从一个开始还鲜为人知的学科,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受到社会重视、关注和欢迎的社会科学。这应归功于广大社会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工作,他们利用社会学关注生活、贴近现实的特长,深入探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社会

问题和社会现象,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出和发表了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或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资料;或为人们起到解困释疑,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增长知识;或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学术参照,甚至有助于开拓其他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领域(当然这是双向的,社会学也从其他学科吸取有益的理论和经验)。

在这20年中,我国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范围很广,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的研究课题有: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调查方法研究;西方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现代化理论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研究;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小城镇问题研究;城市家庭婚姻大型问卷调查;民工潮调查研究;乡镇企业与社会发展研究;发展小城镇与城市化研究;农村村落研究;户籍制度研究;单位制研究;中介组织研究;社区研究;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少年价值观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社会稳定研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研究;收入分配研究;公平与效率研究;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社会经济协调研究;住宅问题研究;贫困问题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妇女问题研究等等。林林总总,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十分广泛。据统计,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立项的研究课题,自六五规划开始,到1999年,共有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and 青年项目320个。加上教委系统、社科院系统和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资助的课题总数在1000个以上。这些课题项目,大部分已经完成,九五规划和近几年立项的还正在进行,已经有一大批研究成果发表。

20年来,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社会学专业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社会调查在8000篇以上,公开出版的社会学专著、译著、文集在1500本以上,而且表现出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发表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趋势。80年代中期以前,每年发表的社会学专业论文只有100多篇,出版的专著只10来本。近几年,每年在各类报、刊发表的社会学论文、调查报告上千篇,公开出版的社会学专著在150本以上,有些还成为畅销书。在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北京图书大厦等大型书店,过去社会学的著作只插放在哲学或其他文科类书架上,现在都设立了社会学专业图书的书架,而且在社会学著作书架前,读者常常是很多的。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多数都是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如何提高社会学为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这样的问题展开,它们不但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提高,而且大大开启了公众的视野、思维,为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分析理论、解决方案、方法和建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

应。20年来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关于社会学基本理论、历史和方法的研究;二是应用研究,这量是最大量的;三是社会调查。

1. 关于社会学基本理论、历史和方法的研究

从社会学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就很重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历史和方法的研究,作为学科的基本建设来对待,因为这是确立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的重要方面。社会学重建一开始,费孝通教授就亲自主持组织一批社会学工作者,集体编写《社会学概论》,并于198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一面世,立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几年工夫,再版了好几次,发行30多万册。此书论述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社会学研究对象、性质、框架、功能定位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此书出版以后,社会学界开展了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等的大讨论,使认识进一步深化。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集体编写了《社会学教程》,1987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沙莲香、贾春增主编出版了《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苏国勋、李培林主编出版了《社会学》。90年代以后,各地、各大学社会学系编写出版了一大批社会学原理、社会学新编、社会学等一类书,共有40多种。这类书有的是集体合编的,有的是个人编写的。出的量很多,这一方面是社会学

著作有广泛的需求,另一方面,这类书尽管各有特长,但基本上是雷同的,有重复出版的问题。

中国学术界有重视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认为历史和逻辑是统一的,对于学科史的积累和研究是这门学科的基本建设。社会学重建不久,就有关于中国社会学史和西方社会学史的论文发表。1987年杨雅彬著的《中国社会学史》出版,该书系统阐述了社会学引入中国、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及其社会历史原因。社会学界还对这门学科的这段历史有过几次讨论。8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邀请重庆师范学院教授陈定闳到系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1990年陈著《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学界正在努力探索中国社会思想的历史渊源,研究中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思想内容,使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与近代传入的社会学衔接贯通起来。1993年,天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王处辉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卷)。1996年,国家社科基金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定为“九五”重点课题,批准立项,给予资助。这个课题组已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正在编一套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多卷本的专著。

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实证学科,社会调查方法、方法论的研究在本学科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00多年来社会学的方法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调查方法体系,尤其是把

电脑技术引进以后,社会统计、问卷调查、抽样技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参与观察法与访谈法等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社会学方法是社会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有长处。不少成熟的社会学方法被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上。所以,社会学重建之后,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受到特别的重视。前述,在80年代初期举办的三次社会学讲习班,社会学方法是重点讲授的内容,以后还举办了多次社会学讲习和培训班,请国内外专家来讲授社会统计分析和调查技术。20年来,中国社会学者在学习和运用这一整套社会调查方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现在多数的调查方法和技术已经得到普及,正在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社情和传统的调查方法结合起来。但总体来说,现在还处于引进、消化和中国化的阶段。

20年来,在报纸和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社会学方法的论文很多,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有:费孝通《关于调查方法——谈谈我是怎样搞调查的》,仇立平《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卢汉龙《调查问卷意义界定》,白红光《对于典型调查中几个问题的探讨》,风笑天《谈谈当前抽样调查中的失误》,林彬《论社会学方法的发展趋势》,苏驼《重视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等。80年代初期,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社会调查方法的著作,如美国学者D.K.贝利的《社

会学研究方法》，H.M. 布莱洛克的《社会统计学》，法国 E. 杜尔凯姆的名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等。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学学者编著的社会调查方法类的书就大量出版了。如：于真、许德琦主编的《当代社会调查科学方法与技术》和《调查研究知识手册》，苏驼等编的《社会调查基础知识》，水延凯著《社会调查教程》，戴建中著《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袁方主编《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李哲夫、杨心恒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宋林飞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90 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教学的需要，各地、各大学社会学系都纷纷编著出版了关于社会学调查方法的著作，总数约在 30 种以上。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史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91 年 12 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正式出版。此书由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教授任主编，自 1986 年开始编撰，历时近 6 年，前后有全国 300 多位社会学专家、学者参加，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劳动，全书共 145 万字。这部巨著的问世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硕果，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培养社会学的专业队伍，确立社会学为重要学科的地位，扩大社会学的社会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

2.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和作出的贡献

社会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科学，应用性很强，它本身是在现代化过程

中产生的，工业化、城市化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各种社会关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由此也产生了一批新的社会现象，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基于这种社会变迁、社会实践并力图加以阐释，找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途径，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社会学这种来自社会实践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品质，自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一直表现得很突出。社会学从来就不是经院里、书斋里的学问。社会学重建恢复以后，20 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继承发扬了这个优秀传统，在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雷洁琼等教授身体力行的带动下，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到农村、到工厂、到实践中去，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查研究了大量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调查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和著作。这些成果都是从实践中来的，都有很现实的实用价值，受到了社会欢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社会学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营养，提高了社会学本门学科的学术地位，扩大了社会影响。

20 年来，社会学工作者调查研究了许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问题，有些前面已经谈过，以下选择几个实例予以介绍：

①小城镇问题的调查研究。80年代初期,社会学刚恢复,费孝通教授就亲自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仁,对改革后的农村发展问题开展了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研究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大发展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下一步应该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以此推动乡镇企业发展,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这个报告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对我国社会学的今后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社会学一恢复,就拿出这样的研究成果,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马上感觉到它的巨大现实意义,也使不了解社会学的人认识到社会学的作用。当然,就社会学学科建设本身而言,这一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当时在社会学专业队伍还比较弱小、基础理论体系还很不完备的情况下,费孝通教授抓小城镇问题的调查研究,抓住了社会学发展的主线,在研究程序上从典型调查开始,循着从个别到一般、从定性到定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这样一条综合研究的路子,这是社会学本身的研究方法,丰富了社区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和农村发展理论,从实证研究上奠定了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也为我国社会学界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的踏实学风树立了一个榜样。随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和江苏省社科院联合组成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经申报被国家社科基金会批准立项为“六五”国家重点课题。该课题经过长期的调查,对小城镇的历史演变、各种发展模式,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写出了《小城市区域分析》、《小城镇大问题》等四本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②家庭婚姻问题研究。家庭社会学、家庭婚姻问题研究是社会学的重点分支学科。社会学恢复不久,家庭婚姻问题研究就被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雷洁琼教授的领导和主持下,1983年“中国五城市婚姻家庭研究”被列为国家“六五”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参加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经济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这一课题是我国社会学重建以后开展的第一个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以及《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等一批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了我国城市家庭消费、家庭生育、家庭教育、家庭老年赡养、家庭网络、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的未来等方面内容。在这一课题研究的昭示下,1985年和1987年两项全国性的农村家庭婚姻研究得以进行。目前我国婚姻家庭研究不仅有了一批研究人才,有了大批研究成果,而且还有自

己的研究机构、杂志,成为我国社会学中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

③社会转型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业结构从1978年二、一、三的排序到1995年演变为二、三、一的格局,与此相应的是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农业的就业人数减少。这样的变化直接带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分化加速,社会多样性增加。这种社会结构变迁在19世纪的欧美工业化国家都先后经历过,国外社会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概括,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和理论。这一理论用来阐述解释我国20年来的社会变迁比较适合。80年代后期、90年代我国的社会学家引入应用社会转型理论来研究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如1990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出版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在总论中就专门论述了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主编的《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陆学艺和景天魁教授主编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等,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我国社会转型有着明显的特点。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同质社会向多样化社会、伦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还经历了从计划

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时进行,这同上述欧美国家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在转型前、转型中都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对我国社会转型的研究表明,我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以及之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都与我国正处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在结构转型期,国家与市场成为两个很活跃的发展推动力量,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转型期生产生活在发生激烈的变动,会像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社会的国家那样产生种种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家庭破裂、离婚率增加、社会风气变化等),再加上体制转轨产生了价格双轨、民工潮、买卖户口等特有的社会问题。何况这种特有的结构转型又在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进行,出现许多社会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社会转型理论为我国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视角,已经受到社会的肯定,但也有些同志、有关部门对社会转型这个名词持有不同意见,有一些争论。

④现代化理论研究。现代化问题是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因为我们正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之中。社会学以特有的视角来研究和阐述现代化问题。我国社会学对现代化研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翻译国

外现代化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开始,随后转入描述性的介绍,再到深入的分析,由研究国外的现代化理论转到研究中国现代化本身,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中国现代化过程及各阶段的特征、中国现代化的环境和机遇,以及中国现代化的有利及不利条件和因素、中国现代化应采取的战略和步骤。刚开始,只有少数人参加这一领域的研究,80年代中期后,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工作者转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涌现了一批专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较早就系统研究了现代化问题,可惜他开拓的事业还未完成,就过早地逝世了。在中青年中,北京大学的孙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的张琢和山东大学的吴忠民都有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问世,受到社会的欢迎。

⑤农村社会和农村发展研究。小城镇研究也是农村社会和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社会学界在深入小城镇研究的同时,不断地开拓社会学对农村研究的领域。农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界最关注的,是我国社会学的传统,老一辈社会学界有不少人,都是研究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专家。这一情况在最近的20年中仍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受到我国社会学界的重视,成了最热门的调查研究对象,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为丰富的。这主要是因为改革首先是在农村突破的,农村的改革一直走在前列,而且也因为农村、农

民和农业在我国整个社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可以说我国现代化的最关键问题不仅是城市问题,而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9亿多农民的现代化,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我国农村在现代化变迁中处于变化最激烈、最明显的时期,传统与现代在农村的交互作用最为明显,这为社会学调查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流派得以产生的最肥沃的土壤,也是我国社会学界为世界社会学发展最有可能作出贡献的领域,所以,他不仅吸引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大量涌入该领域研究,而且也吸引许多国家的社会学家对我国农村进行社会学调查和研究。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学界对农村的研究范围涉及到农村的家庭婚姻、基层组织、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家族和宗族、农民工、社会分层、社区、消费方式、宗教、扶贫、村庄重建、共同体、生活礼仪、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方面。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是个无穷的宝库,中国农村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农村仍将是今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20年来已经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将会有更多有普遍意义的学术成果产生出来,会培养出一批社会学家来。

⑥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应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到本世纪60年代,

人类社会发展观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从重视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如何从定量上把握这一发展,社会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1966年美国社会学家首先提出了社会指标这一概念。从此,社会指标体系研究迅速展开,很快取得了成就,并立刻在实际中得以应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专门在其年度报告中采纳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的许多成果。我国社会学界虽然对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晚。1980年,国家统计局首先提出了社会统计问题,不久便成立了社会统计司,于1985年发表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年“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社会指标研究”列为重点课题。朱庆芳等研究人员对社会指标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他们不但探讨了社会指标所依据的理论,而且还运用所取得的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对人口在100万以上的100多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计算出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这些国家中的位置,即社会发展水平名列第68位。这个成果一经发表,就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课题组还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做了对比研究,其研究成果颇受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的重视。课题组随后几乎每年都发表我国社会发展指标研究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好的影响。社会指标体系研究不仅大大推进了我国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而

且使社会学更加受到社会的重视,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领导人首先是从这里开始了解社会学。在这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下,许多地方政府开始研究本地区的社会指标体系,以提高政府的决策科学水平。

⑦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的研究。如何分析和预测社会形势,是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社会学参与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渠道。党和政府一直很重视形势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年代重视军事形势的研究和分析,在经济建设时代则重视国家农业、工业等方面的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把握。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我国社会问题不是在减少,反而在增加,更需要把握新条件下的社会形势状况。不过,过去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形势作总体分析和预测研究,所以对社会形势的把握和认识容易产生错误,出了一些偏差,如在相当一个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社会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由此采取了许多“左”的措施,这是个教训。到了90年代,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社会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开展我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研究,具体由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和实施。

从1992年夏天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院内外的各方面

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着手研究当年我国的社会发展、改革和稳定等方面的社会形势走向，并对下年作出相应的预测。1993年课题组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社会形势蓝皮书，马上在社会上引起较好的反响，以后每年出版一本，到现在已经出版了8本。从第一本发行6000册到现在增加为2万册，受欢迎程度在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各界了解全国社会形势的比较权威的读物，上至中央，下至县级干部都很重视该书。现在一些省市（如湖南、吉林、辽宁、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也都每年组织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分析、研究本省市的社会形势，编写本省市的社会形势蓝皮书，帮助社会各界和党政领导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形势，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当然，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产生很好影响的也不只是这几项。比如，在这20年时间里，我国社会学对单位制、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住房、知识分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都带来很好的社会效应。一些社会学工作者通过对单位的研究发现，单位是我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细胞之一，单位保障是我国社会特殊的保障形式，单位在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和分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改革前城市分化的基本特征是一种行政分化，一个人的地位不但取决于自己个人所处的行政级别，而且还取决于其所在单位的行政

级别，改革后，单位在城市社会分化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强和扩大，因为单位权力在改革中被扩大，而单位内部的差别却在缩小，单位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收入、地位以及生活条件等，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城市社会的分化。一些社会学工作者集中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凝聚力问题，认为企业的凝聚力是一种群体凝聚力，表现为企业对职工的吸引力和职工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上，增强国有企业的这种凝聚力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个关键环节。还有一些社会学工作者集中关注国有企业中的下岗人员现象，做了大量的调查，提出了一些与经济学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总之，社会学应用研究不断地拓宽范围，挖掘深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提高社会学的学科水平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学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使社会学与我国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强化了该学科本土化特性。

3. 社会调查和社会变迁资料的积累

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乡土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国家、城镇社会转变，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转轨。前一种转变西方现代化国家用了几百年、上百年时间，而我国将在这几十年内实现。后一个转轨，我们在50年代前还曾经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只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才转变成计划经济体制，80年代以后，又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

10~20 年将完成这种转轨。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实现这样的历史性的社会大变迁,在世界历史上是仅有的。

我们这一代社会学工作者,有幸逢上这样一个好机遇,一生可以亲自经历这两种转变的全过程。如果我们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把这段历史用社会学的方法和技术如实记录下来,将是一份很珍贵的社会科学资料。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历史愈久远,这些社会调查资料的学术价值将愈高。这一点国外的一些社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在来访中不止一次地谈到,19 世纪、20 世纪上半叶,西欧北美国家在实现社会转型的时候,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没有很自觉地注意到这个社会变迁,所以从社会学视角,用社会学方法记述这段的著作和资料很少,这是历史的遗憾。他们对我国社会学工作者有这样一个好的历史机遇,甚为羡慕,他们对我们已经做出来的比较客观、科学地记述这两个历史转变的社会调查资料,都很欣赏。

事实上,由于我们中国社会学界有很重视社会调查的好传统,20 年来,已经做了很多记述这两个转变的工作,积累了很多反映这段社会变迁的社会调查资料,有的是结合具体课题而做的,有的则是专门记述这个转变的历史而专门做的大型社会调查。

①课题研究所积累的社会调查资料。1982 年费孝通教授亲自主持和领导的江苏小城镇课题的调查和研究,坚持了多年,调查了江苏省南北

190 个小城镇,除了上述写出的一批重要学术论文和著作,还积累了关于小城镇的区位、人口、劳动力、乡镇企业、经济、社会状况等大量数据和资料。在费孝通教授这项课题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社会学者,也做了很多的小城镇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积累了很多资料。

1982 年由雷洁琼教授指导的《我国城市家庭现状及发展趋势——五城市家庭研究》对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五个大城市的 8 个居民点,4385 户和 5057 名已婚妇女进行了调查,这是我国首次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使用问卷调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使用电脑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和定量分析。最后形成资料、调查报告、论文集和专著等系列成果。其中《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汇集调查的许多数据和资料,这是很珍贵的,出版以后,至今还为国内外学者所引用。由此项课题开启的各地社会学者讲行的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出了很多成果,由此也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记载了一段关于婚姻家庭等方面演变的社会史。

1983 年 10 月,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组织,由社会学工作者和政府机关干部共同实施对天津市的 9 个区 35 个街道的 1000 户不同类型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征询市民对政府这两年工作的评价和对第二年工作的建议,内容包括家庭、人口、职业、

文化、住房、经济生活、家庭结构、家务劳动、家庭教育等 40 个问题, 277 个必填和选题答案。调查后取得了大量数据和资料, 写出了《城市居民对市政府两年工作的评价和 1984 年工作的建议》, 天津市政府对此报告很满意,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并采纳了其中不少合理化建议, 予以实施,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体现出社会学为实践服务的品格, 也提高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这项“千户调查”, 因为既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天津一直坚持了下来, 一年进行一次, 每次都有新的内容, 新的收获。据总结, 第一年就储存和处理了 310 万字符, 10 多年积累起来了, 其数据和资料的积累之丰富是可以想见的。

此外, 还有老年问题的调查、青少年问题调查、犯罪问题的调查、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调查、知识分子调查、民工问题调查等等。事实上 20 年来, 社会学工作者每做一个课题, 都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 只是有些加工整理编辑出版了; 有些则未经加工、未经整理, 散落在书架上或停留在笔记本上、计算机里; 有些则尘封久了, 散失了、遗忘了, 实在可惜。

②专门的国情调查、社情调查所积累的资料。为了拓宽拓深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1988 年 4 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 被列为“七五”(后又列入“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课题, 并具体由中国社

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属于专门的国情、社情调查。从 1988 年 4 月~1999 年 4 月, 历时 11 年, 在总课题组组织协调下, 前后有 3000 多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 还有数千名各地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协助, 对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19 个县(市)自 1949 年以来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情况, 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调查, 每个县(市)的课题组, 由各地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各高校、党校的教师或党政机关的研究部门的干部组成, 按照统一制定的调查提纲、调查问卷找当地的新老干部、各类群众直接访谈, 检阅和摘录这个县(市)的各种文献资料和档案, 并通过抽样对 300~500 户村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最后经课题组分析综合, 并在此基础上写出县(市)情报告, 全面反映这个县(市)40 多年来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乃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演变, 特别是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成稿后, 由总编委员会指定专家审定, 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每卷在 40 万字左右, 一般都有 2 万个以上的各类数据。自 1991 年 5 月正式出版第一本起到 1999 年出齐, 共出 105 本县(市)情报告, 共 4000 多万字。

105 个县(市)分布在全国(除港、澳、台外)31 个省、市、自治区, 包括了全国发达、欠发达、不发

达以及平原、丘陵、山区等各种类型的县(市)。从社会学视角看,县(市)可以说是我国最完整的一个基层社区,工农商学兵,党政财文,样样俱全,深入综合地考察、解剖县(市)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状况,能整体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特点,何况又有105个县(市)的调查[约占全国总县(市)的5%],这对摸准、摸清我国国情具有普遍意义。这实际上是一部通过县(市)情来反映的中国社会近50年的社会变迁史。全书出版以后,在国际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研究现代中国国情的重要参考书,其中的许多资料和数据被多方摘引。广东省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评价这套书时说,这套国情丛书将来会培育出好几代一大批博士来。

1997年《国情调查——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荣誉奖。在这项国情调查完成之后,参加这项社会调查的好几位同志提出,县(市)情调查固然很好,但一个县(市)都是几千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虽然有40来万字的调查研究报告,但因写到了方方面面,毕竟只能简明扼要地反映这个县的主要状况。建议在县(市)情调查的基础上,再在全国做一次100个村的经济社会调查,从微观层次,深入细致地反映农村、农业、农民这50年的变化状况,这更有社会学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个建议得到了原总课题组几位成员的赞同。经过申报,这个

《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已被列为全国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课题。这项课题得到了各地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原百县(市)调查分课题组成员的热烈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部分研究人员已经在河北省三河县行仁庄进行了第一个百村调查的试点调查,并已写出了初稿。

各地社会学工作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记述反映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这段社会变迁历史的重要性,将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选择不同的调研方法,调查不同的研究对象,拓宽社会调查和研究的领域。近几年在社会学界兴起的口述社会史调查就是一个实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几个同志正在开拓这个领域。他们住到农村里,请当地一些老干部、老农民讲述当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社化、大包干、办乡镇企业等的历史过程和掌故。这种通过农村干部群众当事人口述的日常生活事件及其体验,有助于更深入细致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代化的进程,显示出社会学解构社会的学科优势,而且这些口述社会史有具体生动的优点,记下的资料是很珍贵的。

(三)外国社会学的引进、学习、研究和对外交流与合作

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不完全相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国外引进的社

会科学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规律性认识,并不能直接拿来就应用,而要经过一个消化过程,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经过再制作和创新的过程。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是翻译、引进初步传播的阶段;第二是消化,与本国国情、社情的实际相结合,也即本土化、中国化的阶段;第三是再制作、创新、形成中国理论形态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其他引进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

1.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前面说过,社会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中国的,经过初步的传播以后,到30年代初,吴文藻先生最早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当时中国各大学里社会学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多讲外国材料者”,这“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① 吴文藻教授为了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带头用中国话讲社会学课程,并把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引入社会学,带领和支持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费孝通教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的,是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② 在吴文藻教授等的带动下,30年代、4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工

作者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做了多种社会调查,使社会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学中国化”取得很大进展,社会学的学术品位和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

但社会学在解放后不久就中断了,长达27年,而却在这二战后的30多年间,国外的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对此,我国的社科理论界则基本没有了解或知之甚少。1979年社会学重建恢复之后,面临的是理论饥渴,亟需汲取理论营养,一方面是发掘解放前的社会学理论,重印旧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则大量翻译国外的社会学著作,古典的,现代的,经典名作,二三流的社会学手册;长篇的著作,几千字的论文都拿来翻译出版、发行,以应社会的需要。此外,还邀请了美国、欧洲、日本和香港的社会学专家教授来讲课,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1983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创办了《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1983年更名为《国外社会学》)专门译介国外社会学的情况。据北京大学杨善华、李猛的分析,那些年,这个刊物以及《社会学研究》有时也刊登的有关国外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大体可分为四类:

①重要社会学家生平与主要理论观点的“辞条式”介绍;②社会学的

① 转引自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见《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1995)本第1~2页。

② 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第3页。

基本概念；③各门分支社会学；④各国社会学的建制情况，机构、杂志、专业研究人员状况等。

以上这些都可说是“普及性介绍”。^① 国外社会学经过这一阶段的翻译、介绍、传播，许多社会学的名词、概念、范畴、理论、方法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到社会群众中去，逐渐地有些被群众所接受。例如：社区、群体、互动、失范、越轨、整合、结构、功能、转型、社会变迁、社会化、社会控制、安全阀、问卷、样本、抽样等……名词概念逐渐被融进群众的话语中去，逐渐被用到官方文件中去。这是第一阶段，是谓引进初步传播的阶段。这大致在 80 年代末告一段落。当然，国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新的理论还在不断地引进。

第二阶段：消化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实现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应当在第一阶段之后，在有了一定的传播之后，才有社会学的应用，才有同当地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提出来，但 1979 年，中国社会学是重建不是新建，当年做过社会学中国化的老一辈社会学家还健在，而且又是他们直接领导主持了社会学重建、恢复的工作。所以，社会学一面在邀请国外社会学家讲课，在翻译出版国外社会学的著作，另一方面几乎同时就组织并开展社会调查，做社

会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而且做出了前面说过的许多重大成绩。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学中国化的工作已经做好了，第二阶段的任务已经实现了。应该说还远远不够。比如，我们已经从重建社会学初期对西方社会学的介绍，逐渐转向对一些社会学重要理论的研究，已经有《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苏国勋著）这样的研究著作，但还有许多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又比如，我们对群体、社区一类的社会学概念，有了实践的理论和解释，并已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但还有很多概念、范畴，如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等等并没有得到实践的解释。我们至今不能用中国的话语，用中国的资料说清楚中国的社会分层、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所以写文章、讲课的时候，常常还要用外国的材料，举外国的例子。

从根本上说，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就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现在还处在中国化的过程之中。按三个阶段的划分，我们现在大致处在 1.3 或 1.4 的阶段。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做同实践相结合的工作。真正实现了社会学中国化，第二阶段的任务就完成了，社会学就在中国生根了，融进中国社会文化中了，这门舶来的

① 杨善华、李猛：《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述评》，见张琢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471 页。

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就站住了。

第三阶段是创新、发展的阶段。实现了社会学中国化，并不等于说就有了中国的社会学，还要继续工作，要在世界整个社会学体系中，有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概念、范畴，当然最主要的要有中国社会学的宏观理论，而且成为社会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才可以说有了中国的社会学。现在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例如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概念和理论，已得到了国际社会学界公认。但这样的概念和理论太少了，更不要说社会学宏观理论了。中华民族是个有创新传统、有创造性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历史性的社会变迁，在这样伟大的实践中，一定会产生中国社会学的宏观理论，并对整个社会学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但这需要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继续努力。

2. 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得到了国际社会学界、友好人士特别是华裔社会学界的普遍欢迎和支持。1979年3月，第一个来访和进行学术交流的是日本社会学家代表团。团长是日本社会学会会长，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福武直先生，他组织了25名社会学家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费孝通教授等会见了他们，交流了看法。1979年12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庆堃先生组团来访，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同行进行了友好交流，研

讨了开展合作的事项，受到姚依林副总理的接见。姚依林同志听取了中美社会学者的意见，他希望中国社会学者要密切联系实际，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同时要加强国际学术交往，吸取于我国有用的知识和方法。1980年、1981年中国办了两次讲习班，都得到了杨庆堃教授和岭南基金会的资助。邀请讲课的教授是匹兹堡大学和香港的学者。

80年代以后，外国的社会学家来访的人就渐渐多了，其中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有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主任林楠、美国社会学会会长W.怀特、斯坦福大学英格尔斯、国际社会学会会长瑞典乌萨拉大学教授乌尔夫·希格尔斯特其等等。他们或是来进行友好访问，考察城市、农村社会，或是来讲课，传播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日本的福武直教授第一次访华回国以后，就组建了日中社会学会，开展与中国社会学界的友好交流与合作，80年代，在他生前就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日中社会学会代表团访华活动。

90年代，来访的外国社会学家更多，而且遍及日本、美国、欧洲诸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泰国、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一些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也分别来华访问，如以色列的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于1998年来访，并在中国社科院礼堂作了第三条道路的学术报告。特别要指出的是，80

年代后期以后，港、澳、台社会学家来大陆访问、考察、交流合作的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台湾的社会学家，自台湾解除戒严之后，来大陆访问交流的学者逐年增多。1993年春，由著名社会学家文崇一和肖新煌教授率领，有16名社会学家参加的访问团到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厦门和深圳进行了学术访问，费孝通、雷洁琼教授会见了代表团，两岸学者就家庭结构、城市关系、宗教、文化、社会福利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现在，有些国外社会学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协议项目来华的。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通过教委与国外对应机构的协议，每年邀请一些社会学家来学校讲课，社会学研究所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外国人文社科机构的协议，邀请国外社会学家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和考察。当然更多的还是通过个别或访问团的方式邀请来华。总的趋势已逐年增多，现在，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年邀请来访的海外社会学者平均有30多人次，加上各地、各大学分别邀请的，每年在100人次以上。

社会学对外交流的另一个方面是派出去，到国外进行考察、学习、研究和交流。1980年3月5日，费孝通教授应邀到美国丹佛大学接受应用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奖，并在授奖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演讲。是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后走出国门的序幕。随后，出国访问的社

会学者就逐渐多了，既有老年学者，更多的是中青年学者，访问的国家，基本上同上述来访学者的国家是相等的。90年代以后，也是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近几年出访的人次，平均也在百人次左右。

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一些青年学生、中青年学者到国外去学习社会学（有一些是其他学科的学生，出国以后改学社会学的），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些已经学成回国，有些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界科研和教学的骨干力量，如社会学研究所现有的七名归国博士中，有两人是研究所的副所长，三人是研究室的主任、副主任，学术上也已有所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总的情况，还是出去学习的多，学成后回国的少。特别是美国，据说90年代初，在各大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400多人，但至今回国来服务的寥寥无几。对此，有些人有些议论。我个人认为学成回国从事社会学专业工作，固然很好，因为当代中国正遇上做社会学研究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当今世界，没有比在中国从事社会学研究这样的好土壤了。但人各有志，他们留在国外，也为中国社会学界与外国社会学界开展交流和合作起了很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把国外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来，增加中国社会学界同外国社会学界对话的频率，也能起很好的作用。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学者同国外社会学者合作的项目逐渐多

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合作进行课题研究;二是合作举办培训班、讲习班;三是合作举办主持学术会议。

合作进行课题研究,一般是中外社会学者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经过协商,共同申请基金会资助(也有外方单独申请的)建立课题组,进行共同研究,资料共享,共同署名发表研究成果,或分别在本国发表研究成果。这类合作课题,以中美、中日居多,欧洲合作也有一些,90年代以后,同港台合作的也多起来了。研究的课题主要是:家庭、婚姻、劳动力流动、社区建设、养老、社会保障、乡镇企业、青年、妇女问题、小城镇建设、民工潮等等,以农村发展问题居多。这种合作研究,双方都是有收获的,就中国学者来说,除了取得科研成果之外,还因为同国外学者进行共同研究,可以学到一些新的理论,掌握新的调查和研究方法,对发展中国社会学是有利的。

除了社会学重建初期,得到华裔社会学家的帮助,办了三次社会学讲习班外,90年代以来,还同国外和港台社会学者合作,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办过几次全国规模的讲习班、培训班。

1992年6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林南、芝加哥大学教授白威廉、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杨淑惠、康耐尔大学教授孙伟德等一行五人,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福特基金会委托,来华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访问了北

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广州六个城市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同多位中国社会学者交换了意见。回到美国后写成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状况报告》建议福特基金会把社会学列入资助学科之一。在此之前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办事处,只资助经济学、法学和国际问题研究三个学科。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福特基金会决定把社会学也作为资助的学科之一。主要是资助中国举办社会学方法培训班和一些社会学的研究课题。

1995年暑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学校的直接领导下,经国家教委批准,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举办了社会学方法高级培训班,有全国各地的讲授社会学方法的教员和科研人员共38人参加,聘请了美国 and 国内的社会学方法专家,讲授抽样与调查、定类数据的统计分析、中级统计、计算机SPSS软件操作等课程,旨在提高国内社会学研究方法规范化、科学化的水平。前后共6周,教学效果是很好的。

1997年暑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接着北京大学举办这个方法培训班,学员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课程是上次培训班的继续,只是教员则主要请国内专家来讲授,因为都是用汉语讲授,能结合本国的实际,举例用本国的数据和资料,也是6周,教学效果很好。今年,将在南京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本年度的方法培训班。

1990年,台湾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来大陆访

问,经过友好协商,由杨国枢教授等台湾学者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从1991年起,每年在暑期举办“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请台、港的社会心理学教授(都是杨先生的学生和朋友)来讲授社会心理学课程。由全国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人员来参加。在杨教授亲自主持和带领下,前后坚持办了七期,他几乎每次都来,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亲自讲课,同学员住在一起,晚上还亲自辅导。因为大陆那时还没有社会心理学系,(现在也只有吉林大学在1994年办的一个)多数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没有经过规范化的教学,所以这个培训班受到各地社会心理学者的欢迎,来听课学习的人很多,前后有130多人次来参加,有不少是自始至终都参加的。参加学习的人都受益匪浅。培训班培养了许多中青年骨干,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1994年开始,由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与香港树仁学院合作,联合招收培养在职硕士研究生,由社会学研究所每年派出教师到树仁学院和该校教师一起讲课,学生写出毕业论文后到北京答辩,通过后,授予硕士学位。合作多年,已有几批学生获得学位。

对外交流还有一种形式是合作召开双边多边的地区性、国际性学术会议。双方或几方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联合向国际组织、基金会或大企业申请经费,邀请与会议主题有关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参加

会议,进行学术研讨。这样合作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从80年代后期就陆续召开过,90年代以后,也是逐渐增加,近几年是年年有几个在国内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多数在北京,在上海、天津、南京、沈阳、杭州、昆明、武汉、广州等地,也都分别召开过。如1990年4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资助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地区家庭未来讨论会”,有10余个国家、地区的40多位专家参加,提交的论文有30篇。1991年7月,为了促进中外社会学工作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交流,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受福特基金会资助,召开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有英、美、法、瑞典、荷兰和本国学者40多人参加,开得很成功,促进了以后多项合作课题的开展。1993年8月,辽宁社科院、日本学术振兴会、法国人文科学中心联合,在沈阳召开“区域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有日、美、韩、法和港台地区及大陆学者60余人参加,进行了研讨和交流。199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台湾和日、美、韩、比利时等国和地区的40多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研讨了东亚向现代化世界转变的历史等问题。

经过多年酝酿和筹措,1995年11月2日~5日,第六届亚洲社会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21世纪的亚洲社会与社会学”,有来自

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以色列和港台以及国内的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名社会学家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 150 多篇，就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亚洲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亚洲的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21 世纪的社会保障，21 世纪亚洲地区的家庭与生活品质，21 世纪亚洲经济发展、人口、资料和环境等六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务委员、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雷洁琼教授因公出差在外地，还专门发了贺信和书面讲话。中国社科院原院长马洪、副院长汝信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出版了《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论文集》。

三、社会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社会学这门学科，虽然是恢复重建，在这 20 年中经过了风风雨雨，但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健康发展，社会学工作者的队伍在迅速扩大，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成果在大量涌现，社会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在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实践充分证明了恢复重建社会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传播，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普及，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社会、认清国情、分析形势增

加了一个视角，提高了政府部门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对全面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社会学重建以后，社会学工作者就对现代化理论，对社会发展战略，对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表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要素，只有考虑到经济、社会诸构成要素的全面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各种情况下，现代化事业才能稳定持续协调地发展，才能有高效益和高速度的发展，才能避免和尽量避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提高全社会对社会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产生了积极效果。1982 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计划时，明确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社会发展的地位。并从此成为惯例，使每年的发展计划不仅包容了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而且增加了扶贫、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各项社会发展的内容，使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计划。与此相适应，国家政府中主管社会发展的部门和机构也相继成立，国家计委成立了社会发展司，国家统计局成立社会统计司，国家科委成立社会发展司，民政部成立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研究所，还成立了社会工作与社区服务研究中心，公安部、监察部也都成立了研究社会发展、社

会问题的研究机构。广东省专门成立社会保险局,上海浦东新区建立社会发展局。更为可喜的是各级政府在设计发展战略和工作计划的时候,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过去主要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的观念,树立了全面整体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近几年,政府机关,新闻媒体主动找社会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进行咨询和要求合作、协作的事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制订发展战略的规划也主动找社会学工作者参加。近几年社会学工作者成了忙人,社会学的书籍成了畅销书,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比较好分配,社会学本科和硕士点、博士点成了青年报考的热点。

第二,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被应用于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决策过程,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社会学重建以来,广大社会学工作者对我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直接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如前述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问题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课题组所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制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计划的重要依据。从1983年开始,天津市政府委托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和统计部门,在天津市进行“千户(问卷)调查”,主要内容是居民对市政府前段工作的评价和对以后工作的期望。通过调查,社会学工作

者把调查的情报、信息和结果及时反馈给政府领导决策部门,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这项“千户调查”已坚持多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社会学研究所80年代末,对农村阶级进行了分层研究,提出了农民已分化成8个阶层的结构。此项研究被农业部农研中心所采用,依照这个分析框架在1993年对全国农村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查,初步弄清了目前农民分化和流动的现状,成为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社会学研究所在1994年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农村现代化》一书,此项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将经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现代化发展等四个阶段,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政策建议。此项成果受到各地的欢迎,不少市、县据此来修改制定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规划,在实践中起了较好的指导作用。另外,广大社会学工作者还进行了一些专项的调查和研究,如家庭婚姻、人口控制、扶贫、民工流动、青少年犯罪、住房制度、养老保险、社会保障……这些研究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实际工作部门所吸纳和采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

第三,社会学的发展为调查社会,认清国情、地情提供了新的调查理论、方法和工具,对提高社会调查的水平、质量和扩大调查范围起到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有自己独特的调查理

论、方法和技术,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规则。这十几年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对这套理论方法引进、消化、应用已做了很多努力,已经逐步掌握了并且尽可能使之中国化,还推广应用到社会各界(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学科)。大家知道,正确的决策,应建立在对社会实际情况全面深入的认识上,进行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则是认清国情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各种科学的调查方法逐步得到应用和推广,如问卷调查方法、参与观察方法、抽样方法、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模型方法、预测方法等等。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分析处理调查的资料和数据,极大地提高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性,提高了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分析和预测的准确性,提高了速度,提高了效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社会调查所得的资料,通过计算机分析得到了的数据,为实际工作部门进行工作和决策,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前述由中国社科院主持,由社会学所组织实施的百县(市)情调查,几年来,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取得了数以万计的数据和资料,对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城乡状况、居民生活有了深一层的了解,而且都有了数量的根据,对于深入认识国情,对于各地制订进一步发展计划,都准备了条件。90年代以来,各地、各部门成立了相当多的调查中心、调查研究所,有些是政府部门办的,有大学办的,也有民办的,他们都运用社会学

调查理论和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有一批成果,有些已起了很好的社会作用。

第四,社会学的发展为社会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及做好社会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逐渐分离,社会管理的作用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社会管理是涉及多种社会因素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好多方面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社会学作为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的科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能够为加强社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这些年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被具体应用到各企、事业单位在制订发展规划,进行科学管理等等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社会学很多分支学科,诸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工业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体育社会学、法社会学、医疗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等等,这些分支社会学的发展本来都是从各系统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科学总结,逐步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对这些系统的管理和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和协调,调整内、外部关系,调动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性,对推动本系统本单位健康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第五,社会学知识在干部、群众中的普及和提高,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本质上

讲,社会学是研究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强调和谐、协调和稳定发展。社会学知识应当向全体公民普及,随着社会学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为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掌握,人们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教育子女、处理同单位和他人的关系,处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就会相应提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科学和合理。为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达到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目标,社会学的发展和普及是必不可少的。在不少发达国家里,他们在高中阶段有开设社会学这门课的。

我国的社会学这门学科所以能在这20年的时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学的发展是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需要。恩格斯说过,社会的需要,比办几十所大学的推动力还要大。社会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现代化出现而产生的,它也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得到成长和发展。正是有鉴于这种需要,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发出了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也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学等学科学习的号召。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正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要求而作的,而且不断地给予社会学的成长以各方面的支持,这正是社会学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二,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得力

于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针。大家知道,社会学刚刚恢复和重建的时候,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以及其他院领导同志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重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院党委召开会议研究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问题,对于建会和建所的方针,都作了明确的决定,社会学研究会和社会学研究所就是在院党委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学研究会建会的时候,就明确社会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学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费孝通教授据此在那时就作了明确的阐述:“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建国以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但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以后又多次重申: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机构都能够坚持这个学科方针,有效地保证了我国社会学事业健康发展。

第三,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中,坚持了既重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又加强应用研究的方针,坚持一手抓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建设,一手抓进行社会调查为现实服务的方针。这本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这方

面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身体力行，他们亲自深入农村、街道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发挥社会学的功能，扩大社会学的影响，推动社会学的发展，而且带出了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好作风，培养了一支科研和教学队伍。正因为这样，社会学这门学科重建不久，就在社会上打开了局面，这些年来，广大社会学工作者正是坚持了这个优良传统，深入社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取得了各方面对社会学的支持，社会学本身也发展起来了。实践证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服务，是社会学生命力的所在。

第四，我们在引进外国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对待各种社会学的理论流派和方法，不盲目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使其为我所用。如我们在引进社会学的一些新的调查方法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全盘照抄，而是将其与我们原来行之有效的蹲点调查、“解剖麻雀”、开座谈会、入户访谈等传统办法结合起来。对他们的方法也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改造利用，使社会调查和研究更加科学合理。这些年，社会学界同国外同行的合作、交流是很多的，我们在重建过程中，一些友好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华裔友好学者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恢复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在和国外同行交流合作时，都能坚持洋为中用、以我为主的方针，所以总的说

来，这些年我们社会学的成长和发展是健康和有序的。

四、社会学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发展前景

尽管在 20 年时间里我国社会学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学发展仍然落后于国外许多国家的社会学，仍然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建设对社会学提出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的要求，还不能及时而有力地阐释我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新问题和现象。在行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继续阔步前进，社会变迁迅速，社会新问题、新现象还将大量出现，这给中国社会学提出了必须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给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机会，所以，摆在中国社会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也将更加艰巨，任重道远。

我们首先应该正视我国社会学发展还存在的许多问题和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量力而行，也才能有的放矢地尽力而为，准确地把握和了解目前我国社会学的所长和所短，所处的条件和自身的水平。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社会学确实还存在许多不足，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尽管我国有一批社会学工作者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近几年有对理论研究升温的兆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仍然还处在

主要是引进和研究国外社会学理论的阶段,还谈不上创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或理论流派(当然,这个任务不是理论研究单独所能完成,必须要结合实证和应用研究才行,但是理论研究却是重要的基础)。而在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还缺乏系统性和及时性,例如在对一些著名社会学家或社会学流派的理论介绍上只关注其中的某个方面,而忽视了一个人或一个流派的理论的前后连贯性和系统性,表现在翻译著作上只选择其中的一、二本专著,进行介绍,一些著名社会学家的许多代表著作迄今还没有被译介过来。还处于介绍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概念,并试图用其中一些概念和理论进行实证和应用研究的阶段,但是对许多理论及其概念还有待继续消化并转化为自己的真正话语,离形成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还有很长的距离。

第二,我国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低层次、低水平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调查比较多,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强有力支持,特别缺乏一些中层理论的支持,许多社会学课题研究停留在社会现象的描述,缺乏深入的分析,未能形成高层次的理论模式和概念,这也反过来影响了我国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同时,目前我国许多社会学课题研究低层次重复比较多,缺乏学术积累和递增,彼此缺乏有效的学术衔接,成果共享程

度以及可比较程度低,更难以与国际社会学进行有效的学术对话,还有一些研究缺乏理论假设,多为事后归纳总结,缺乏深入的分析,所以我国社会学存在着似乎研究成果很多,但是真正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精品不多的现象。这都与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密切相关。

第三,许多社会学分支学科研究相当薄弱,跟不上我国现代化建设对社会学提出的紧迫要求。比如,经济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等在我国可以说很不发达,限制了社会学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参与作用,而其他分支社会学虽然有了一定研究,但是也缺少理想的发展成果。在发达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分支社会学学科目前已经达到167个细科^①,在我国,目前还只有几十个细科。

所以,我国社会学仍然面临着艰巨的学科建设和解决我国社会发展变迁现实所提出的新课题的双重艰巨任务。当然在完成这双重任务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一方的进步将大大促进另一方的进展,但是一方的落后将阻碍另一方的发展。暂且不说前者,就拿后者来看,我国社会学要完成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从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来看,可以说,当前我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最能给社会学提供广阔

①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第322页,学习出版社,1997。

的用武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真可以说中国这一代社会学家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社会学的好机会。但是从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国社会学家面临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和重大的社会责任。从我国社会学界目前正在进行的和关注的课题来看,我国社会学大体上面临着这样几方面的应用研究任务:

1. 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但跟不上我国社会变迁的脚步,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瓶颈环节。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下,我国城镇实行的是单位保障制度,其前提是单位不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仅仅是执行国家利益再分配的一个环节,但是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情况下,单位已经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单位之间的分化日趋明显,一些行业的单位依靠垄断地位经济状况很好,而一些单位本身面临着生存危机,但同时单位保障水平相对过高,已经成了许多单位(如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当然单位保障制度还存在其他一些明显致命的缺点,比如它覆盖面小,不能对没有单位的人给予保障,同时阻碍人员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之所以难以取得有效的结果,与我国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密切关系。过去我国农村基本上实行的是传统的家庭保障制度,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合理,这种保障制度在不存在社会流动

和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还是有一定的效力,当然也有些家庭由于过于贫困,谈不上家庭保障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市场经济和非农经济越来越发展,与此同时社会风险也越来越大,仅仅依靠家庭保障已经远远不够了。加快改革目前已经很不适应实际情况的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已是当务之急。建立一套适应我国发展水平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不仅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而且也关系到在我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因为健全、有效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稳定机制。在国外,社会保障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社会学虽然也开展了这方面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提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模式,并从理论上给予有力的解释。这需要我国社会学做更艰巨的努力。

2. 城乡关系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非常明显,已从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演变为现在城乡交流日益扩大的格局,但是不能不看到由计划体制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还存在,甚至还根深蒂固,并且已经与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很不适应,已经在阻碍和限制我国现代化建设了。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因为不难想象一个绝大多数人口还是农

民或者生活在农村的国家，怎么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呢？

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关系变迁成了当今世界最有学术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应该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沃土。我国城乡关系变迁研究涉及到传统与现代、单一性与多样性、结构分化与社会流动、民间与国家、城市化等等一系列极具前沿性的社会学学术问题。

自从社会学进入我国后，农村和城乡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同样自从1979年我国社会学恢复之后，我国社会学界再次把第一关注点投向农村和城乡关系研究。到现在为止，我国社会学在对城乡关系的研究上确实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至今还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从这一领域研究中诞生出我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如前所述，农村的课题和研究成果很多，但有影响的精品甚少。

当然我国城乡关系还没有理顺，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还有更多的新问题涌现。我们相信，我国的农村和城乡关系仍将是我国社会学重点开拓的领域，如何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城乡关系，也是现实对我国社会学提出的要求和挑战，社会学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

3. 阶级阶层问题研究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和利益关系已经发生明显

的变化，由此带动我国城乡居民走向分化和重组，各种新的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不再局限于过去那样的工农商学兵、农民工人干部这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了，他们之间的职业、收入、地位、身份、权力、声望、认同乃至价值观念等都发生明显的变化，比如，同样是工人，过去只有国营企业和城乡大集体企业的工人两类，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大，但是经过20年的变化，现在工人内部的差别已相当大，既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又有乡镇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外资和独资企业工人，还有许多农民工等等，即使是国有企业工人，还分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不同工人之间的差别相当大，就是同一个企业中的工人差别也相当大；同样是农民，现在他们的异质性程度相当高。这种情况向我国社会学提出许多尖锐的、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问题：我国当前存在不存在明显的阶级阶层？如果存在，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社会学是否能将他们分类出来？20年来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发生分化和重构？怎样说明当前存在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这样的分化和重构预示着怎样的社会发展和变化趋势？如何判断这样的现状和由此而来的变化趋势呢？各种阶级阶层理论在我国当前的阶级阶层变化面前是否受到挑战？是否需要我国自己的阶级阶层理论？或者说，会不会产生我国新时期的阶级阶层理论？

我国社会学对当前我国阶级阶层情况也做了许多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还没有有力地解答上述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立了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正在组织协调对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化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但是我们看到,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面临着许多理论和实证调查的困难。

4. 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已经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自80年代以来,“保护地球”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较科学地界定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变得十分突出,许多地区采取的粗放性经济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尽管我国采取了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但是城市管理远远滞后,空气污染和缺水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危及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城市发展。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等等各个方面,因此需要通过综合研究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对策和方案。社会学虽然进入这个领域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对策,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目前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已经诞生,有一些社会学家

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是我国社会学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显然不但没有跟上世界的研究步伐,而且也很不适应我国发展的需要。如何推进我国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加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以适应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要求,这一任务已经实实在在地向我国社会学界提出来,当然也是给我国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中提供了一个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

5. 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与战争、生态恶化等问题一样,成了当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问题。目前世界上有10亿多人口正在面临贫困的危险。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解脱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我国政府承诺到2000年基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解除贫困,涉及到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贫困不仅仅只包括绝对贫困,而且还包括相对贫困。目前我国除了农村还有4200万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城镇地区还有上千万贫困人口。由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很快消灭贫困现象(尽管我们希望尽快消除它),贫困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原因,还有自然环境等原因。社会学应该研究究竟是哪些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效应,政府和社

会的扶贫行动和传递系统如何,如何解决脱贫了又返贫的问题,如何防止贫困现象的蔓延等等问题。贫困问题历来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我国社会学更应该重视,把它放在我国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大框架中进行审视、研究,并寻求有效的扶贫对策。

6. 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科技在本世纪各国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最近的20年时间里,科技的作用更加明显,各国已经看到在当今国际竞争中胜败的决定因素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技实力的较量。科技的发展不仅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实力,而且也已经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结构。为此,社会学纷纷开展由科技带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虽然我国的科技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不能看不到,科技的发展已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实,比如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仅仅在三、四年前我国的网民还寥寥无几,但是到今天已经发展到200多万之众。我国政府已经把科教兴国定为基本国策,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科技究竟将给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带来什么?如何促进科技发展?如何防止科技的副作用?科技使社会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等等问题,不是科技本身所能解决和回答得了的。这迫切需

要人文社会科学介入对这些问题研究,社会学也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社会学对科技的发展及其后果等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种状况不但不利于着力关注社会现实研究的社会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更不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如果社会学不能关注社会的最新变化和发展,那么作为一门学科,它就有可能面临生存的危险,当然这种危险显然也不利于社会发展。

我国现实社会向社会学提出的研究任务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确切地说,我国社会处在如此激烈和快速的变化之中,对 sociology 提出的研究课题那是非常之多的,难以穷尽。这为我国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研究空间。展望未来,我国社会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将会迎来更大发展的时代,也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学科地位上将有可能成为综合研究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门大学科,在学术建设上将越来越趋向规范化,同时在国际学术关系上通过提高本土化水平的过程,增强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诞生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流派,以至在国际社会学发展中发挥一定的话语主导作用。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我国社会学向大学科方向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它的成长却是相当的迅速,以至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成了一门从

业人员仅次于经济学的很重要的社会科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是在理解和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成长起来的,反过来可以说它是现代化这块沃土上长成的一棵大树。我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到今,还只有20年,但是其发展势头却是相当地快的,且不说学科建设成就,就拿社会对它的认识而言,现在已经开始超出许多老学科,成为社会各界所持续关注的一门学科,这也是由于它的关注和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现代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性,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也没有明确的具体界定,但是它的一些主要特点却是被人们所认同的,如社会的多变性、变化的快速性、复杂性、难以预料性等等。现代性的存在在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多样选择的同时,也给人们对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稳定的认识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如此,还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带来各种各样的张力、矛盾和整合问题。社会学正是力图通过对现代性的解读,使人们把握变迁的现实和现实的变迁以及由此相随的社会秩序和稳定问题。所以,社会学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也提供了认识社会的钥匙,因而获得了迅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现代性问题,而且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背景

不同,我国的现代化不但面临着发达国家现代化后所存在的外部压力,而且也有着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在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平衡、公平与效益、变迁与稳定、竞争与就业、城市与乡村等各种关系。显然,社会学对这些关系的研究具有许多优势,比如整体性优势、系统性优势等,但是我国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完全胜任现实的要求,今后的研究在不断开拓研究领域的同时,还要拓宽宏观研究视野,加强对分支学科的统合能力,使我国社会学成为一门大学科。

第二,大学科地位的确立除了巨大的现实需求外,还有赖于我国社会学自身的学术建设,特别是有赖于学术研究规范化水平的提高。虽然规范化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至少要体现学科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特征(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盖·劳丹的观点,按另一位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恩的看法,那就是要有自己的范式),具体到社会学这门学科上,应该包括这样几方面:①应在社会学学科的前后传承的关系中确定要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经验问题,按流行的话语,那就是要树立学术问题意识。“科学中形成的问题必须放在整个学科探索事业的背景中才能被理解。”(H. 西蒙的话)^① 这要求:一

① 转引自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第3页,华夏出版社,1998。

方面研究任何问题（包括理论和经验问题）应该是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背景中引申和生发出来，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该对社会学的发展是有意义、有价值和有贡献的。显然，作为每个社会研究人员，也会追求这样的学术意义。②要显示社会学方法论的特性。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要求，在社会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开展严肃的研究。③营造平等的学术对话共同体。在学术研究上要消除文化霸权，提倡平等对话，当然这种对话应是具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切忌学术泡沫和学术炒作。实际上，自从我国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以来，我国社会学界没有放弃对学术规范化的要求，但是规范化只有在不断的研究中才能得以提高，这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努力逐渐提高的问题。相信经过我国社会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我国社会学的规范化水平将会越来越高。

第三，我国社会学的队伍也有待扩大。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对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学队伍建设还处在自发发展的状态。例如全国还有约 1/3 省区的大学没有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内蒙、河北、河南、山西、江西、新疆、宁夏、青海和西藏等在这方面几乎还是空白，这些省区中有的连社会科学院也没有社会学研究所，即使有，因为没有专业人才的补充，科研队伍还相当薄弱，

这同当前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很不相适应。这需要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推动，争取用 3~5 年时间，在这些省区的大学里，都能至少建一个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推动社会学队伍的建设和扩大。就目前社会学的整体队伍而言，社会学的队伍也需要发展和提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只有 3500 多人的社会学科研和教育的专业队伍是远远不够的，满足不了现实需要。

第四，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话语系统主要还是引进版，而我国社会学要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那么非要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相应的话语系统不可，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要加快社会学中国化过程。我们主张中国化（有些学者称为本土化），并不是不管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整个规范系统，而是在遵循普遍的规范原则基础上，在理论、规范上有所创新。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快速的社会变迁，确实为我国社会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广阔和前景。就拿研究方法来说，各国社会学研究之间最有共通性，但是我国的社会的特殊性却使不少被公认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失效，这就需要我国社会学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寻求更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研究方法；至于在各个层面的理论创新，那更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相信，经过我国社会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本土上将会涌现一批世界性的社会学巨著，产生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和宏观

理论,从而不但扭转当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不平等的对话格局,而且还为世界社会学提供一个具有主导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那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就可以说是建立起来了。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1989,《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1994,《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所编,1996,《中国社会学年鉴》(1993~1995),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 中国社科院办公厅、科研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新时期社会科学的回顾与前瞻》。

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1997,《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

6.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1986,《社会学纪程》,中国展望出版社。

7. 杨雅彬著,1987,《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8. 张琢主编,1998,《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学

——纪念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 20 周年

郑杭生

邓小平是当代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思想和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当代每一个中国人,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代每一门中国社会科学。其中,中国社会学与邓小平的关系,可以说是尤其不一般。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邓小平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命运的良性转折,而且表现在他的理论包含有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也就是说,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还是内在

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的。

关于前者,我认为,在纪念社会学恢复和重建 20 周年时,显得特别有意义,中国社会学学者,永远不会记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学的这一功绩。关于后者,我认为,研究和明确这些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既能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推进对它的深入研究,又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并把邓小平理论对学科的指导意义具体化。

一、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